

# 清代人士的明十三陵與景帝陵情懷

朱鴻\*

## 一、前言

清朝對勝朝陵寢刻意保護，南北兩京明代帝陵除在鼎革之後的初期外，其後少有破壞，仍繼續展現她的風華。清朝入關之初，禮葬崇禎帝后，興建思陵。又屢頒諭令，要求地方官恪盡保護明代陵寢之責。訂定制度，加以管理，以時祭祀。順治、康熙、乾隆、嘉慶更是親謁明陵，表達對明朝統治者的尊重。乾隆年間，也對明陵進行修繕。諸此，不完全是基於懷柔漢人的政治考量，它體現了清朝統治者的高度文化素養，以及對陵寢的重視。然而另一方面，在尊重與保護的背後，清帝也藉詩文對明朝君主及歷史表達其看法，進行褒貶。修繕也有未盡遵照明朝原貌，減殺規制者。

再者，由於皇室對勝朝陵寢採取廢陵禁護陵園的態度，清朝士大夫（包括明遺民）乃能進入明陵，留下有關明代陵寢的著述，甚至圖繪。這些文獻多出於實地考察，雖不免有些謬誤，也有彼此記載矛盾者，但卻有極重的史料價值。可以透過文字的敘述與圖畫，瞭解作者寄情明陵，陰寓故國之思的情懷。

清朝人士對勝朝陵寢的情結，歷代少有。本文以清廷對北京明十三陵及景帝陵的種種措施，及帝王謁陵有感而發的詩文，以及官民人等的明陵著述與圖繪，探究清代人士多樣複雜的明陵情懷。

## 二、清朝對明天壽山陵寢的管理與維護

清朝對勝朝陵寢採取刻意保護的做法，並非完全基於入關之後統治需要的考量，努爾哈齊對明太祖出身微賤歷盡艱危卒成帝業甚感欽佩，<sup>1</sup>甫入北京，爲了遷移宗廟中明代歷帝神主，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第念曾爲一代之主，罔宜輕

---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sup>1</sup> 《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1月第1版），10/3a，天命十一年正月己酉條。

襲」，特遣大學士馮銓祭明太祖及諸帝。<sup>2</sup>隨後，定守明朝諸帝陵寢併祭典，設故明長陵以下十二陵司香內使各四人。<sup>3</sup>並將明太祖及功臣徐達、劉基入祀帝王廟，以示崇敬。<sup>4</sup>克南京擒福王，下令守護洪武陵寢的明朝官員且暫留，將其官役地畝錢糧數目俱明註於冊，送京裁奪。<sup>5</sup>基於保護勝朝陵寢的原則，盜發者棄市，<sup>6</sup>禁伐昌平故明陵寢樹木。<sup>7</sup>禁令雖嚴，但地方官似未嚴加守護，十六年底，順治巡幸畿輔，道經昌平，見明代諸陵殿宇墻垣傾圮已甚，近陵樹木多被斫伐。責令工部即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見存樹木永禁樵採。並添設陵戶，令其小心看守。責令昌平道官不時嚴加巡察。工部仍酌量每年或一次或二次差官察閱，勿致疏虞。<sup>8</sup>又因向來給明朝陵寢守護內員人戶地畝數少，以致各陵祭品備辦不敷，只在大紅門外總祭。諭令嗣後除神宗定陵不行致祭外，每年應由太常寺差官行春秋二祭。<sup>9</sup>順治朝對明朝陵寢的保護著重的正是昌平的天壽山陵區，採取設立太監陵戶，給以地畝，令其虔修禮祀，禁止樵採的政策。

康熙延續順治的政策，然對南京孝陵的關注遠超過北京的十三陵。曾令有司各官春秋致祭明孝陵，嚴禁採樵，並設守陵戶朝夕巡視。但為日已久，不無廢弛。廿三年（1684）十一月首次親謁明孝陵後，諭江南江西總督、江蘇巡撫，督令地方官不時巡察，務俾守陵人役用心防護。勿致附近旗丁居民，仍前踐踏。所有春秋二祭，亦必虔潔舉行，以示崇重古帝王陵寢至意。<sup>10</sup>康熙晚年發生偷掘

<sup>2</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8月第1版），5/16b-17a，順治元年六月癸未條。

<sup>3</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6/6a，順治元年七月庚子條。因神宗與清朝有嫌，定制之初，裁定陵典禮。順治八年六月，「思前朝帝王陵寢理宜防護，我朝凡事俱從寬厚，今神宗陵著照故明十二陵例，以時致祭，仍設太監陵戶看守。」（《清世祖章皇帝實錄》，57/17a，順治八年六月辛未條）惟十七年九月，又規定「嗣後除萬歷陵不行致祭外，每年應春秋二次、太常寺差官致祭。」（《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40/10a，順治十七年九月丁丑條）

<sup>4</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5/1a-1b，順治二年三月甲申朔條。

<sup>5</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7/6a，順治二年六月丙寅條。

<sup>6</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25/4b，順治三年三月己巳條。

<sup>7</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46/9a，順治六年十月辛卯條。

<sup>8</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30/4b-5a，順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條。順治諭旨刻石為碑，立於長陵棲恩門前左側，今仍完好，稱「長陵龍趺碑」。

<sup>9</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40/10a，順治十七年九月丁丑條。

<sup>10</sup>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9月第1版），117/16a-17a，康熙廿三年十一月甲子條。有關清帝對明孝陵的崇禮，請參見朱鴻，〈情繫鍾山—清代人士拜謁明孝陵的活動〉，《「明太祖及其時代」國際學術會議論文匯編》（朱鴻林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

明十三陵情事，採取絕不寬貸，處以極刑的嚴峻處置。<sup>11</sup>並念明代諸陵年久、或看守之人不謹，致遭盜掘。遣諸皇子往各陵祭奠，詳細查明情狀具奏。<sup>12</sup>諸子回奏，宮殿與一切屋宇修葺堅整，歷年雖久毫無動壞，看守人等亦俱謹慎。<sup>13</sup>陵寢地面屋宇為木造建築，半世紀未進行大規模修繕，豈能堅整毫無動壞；既遭盜掘，看守人等訂有疏忽，諸子以「謹慎」回奏，顯然失實。由此可見康熙對天壽山明陵採取的是寬鬆的保護政策。

康熙的明陵政策有值得一敘者，崩後留有未頒上諭一道，「以明太祖崛起布衣，統一方夏，經文緯武，為漢唐宋諸君之所未及，其後嗣亦未有如前代荒淫暴虐亡國之跡。欲大廓成例，訪其支派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春秋陳薦，仍令世襲。」<sup>14</sup>雍正即位，命從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簡王之後，籍隸鑲白旗的朱文元後裔，現任直隸正定府知府朱之璉一支內，查取譜牒，由吏部揀選引見，擇用一人。並飭禮部差官，陪同其人告祭明太祖陵及昌平十三陵，以承祀事。祭畢，令回北京居住，嗣後每年行春秋二季。<sup>15</sup>康熙以明太祖宗祀淪絕，訪求支派一人，授之官爵，恪奉烝嘗的遺志，雍正繼志存恤，選明太祖後裔朱之璉世襲承奉祀事，頗有上古遺風。之璉過世，以祀典不可間缺，令其弟姪內一人代行致祭。<sup>16</sup>

雍正也曾飭昌平州知州、昌平營將差委人員，時加巡視位於昌平的十二陵(定陵除外)，務令地境之內清淨整齊。陵戶若有不敷，即酌量增添。陵寢防護無誤之處，亦責成相關官員每年歲底冊報工部彙奏。<sup>17</sup>

乾隆繼統，了解到天壽山陵寢受保護的情況似是十分不理想，「向設司香太監十六名。多係虛設。且距京稍遠。稽查為難。」乾隆廿一年（1756）對順治以來的定制有所改變，裁撤守陵太監，所遺養贍地畝交地方官，同原撥祭地招佃

---

研究中心編印，2006.3.28），頁 796-819。

<sup>11</sup>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270/16a，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乙酉條。

<sup>12</sup>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271/3b-4a，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己卯條。

<sup>13</sup>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272/4a-4b，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丙申條。

<sup>14</sup> 《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0月第1版），11/25b-26b，雍正元年九月乙未條。

<sup>15</sup> 《清世宗憲皇帝實錄》，16/17a-18a，雍正二年二月丙辰條。

<sup>16</sup> 《清世宗憲皇帝實錄》，90/7a，雍正八年正月辛巳條。

<sup>17</sup> 《清世宗憲皇帝實錄》，79/12b-14a，雍正七年三月甲寅條。

收租，辦理祭品。並令選老成殷實者充補陵戶守護。昌平州明代妃塚六處，原由十二陵太監承管，今既裁，應添陵戶四名，各給養贍地三十五畝，餘地並交地方官招佃收租。西山景泰陵及墳塋數處，原有司香太監六名，亦應并裁，酌設陵戶二名，照昌平州例辦理。<sup>18</sup>

裁撤守陵太監，將陵寢管理之責交由陵戶，是清代對勝朝陵寢管理制度的重大變革。惟陵寢的維護不全在嚴密看守，防範盜掘樵採，而在於不時修繕。此前，除明孝陵外，清朝對明朝陵寢並未有維修的保護政策，乾隆晚年在謁天壽山諸陵，感於明陵年久失修，下令進行殿宇的修復，《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記其事云：

上致祭明長陵。諭直隸昌平州爲前明陵寢之地，本朝定鼎後，我世祖章皇帝即命以帝禮改葬思陵。並工部修葺諸陵，親臨奠酌。並禁止樵採，添設陵戶。我皇祖聖祖仁皇帝亦曾親臨致奠，並飭地方官加意防護。所以加禮前代者，最驕優渥。朕此次行幸湯山，取道昌平，躬詣長陵致奠。見諸陵寢，明樓享殿多有損壞，神牌龕案亦遺失無存，爲之慨然弗忍視。由明代中葉以後，國事廢弛，全不以祖宗爲念，於陵寢並未修葺。至末年復經流寇擾亂，亦無人守，以致日就傾圮。若其後代之君，果能歲加繕治，整齊完固，逮今不過百有餘年，亦何致頽剝若此。又諸陵前，雖建有碑座，均未鐫泐，未審彼時是何意見。今親臨奠酌，周覽之下，深爲軫惻，自應重加葺治，增設龕位，俾臻完備。再我朝開闢之初，睿親王以我師克取遼東，時明之君臣惑於形家謬說，疑金代陵寢與本朝王氣相關，將房山縣金陵拆毀。是以爾時亦將定陵享殿撤去，停其祭祀。然明樓寶城，仍存其舊未壞也。維時我世祖尙未親政，其事實由睿親王建議，亦非世祖意也。今國家一統，已歷百數十年，勝朝陵寢，自應一體修復。所有定陵享殿，著仍行修建，春秋祀事如故。又明世宗永陵，前因尹嘉銓條奏，將其祭祀裁撤。

<sup>18</sup>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515/14a-14b，乾隆廿一年六月辛酉條。

但前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天啓，是以於歷代帝王廟中撤其位祀，而陵寢仍前致祭。明世宗雖溺意齋醮，尙不至如萬曆天啓之昏庸失德，其陵寢自應照前一體致祭，以昭大公。我國家受天眷命，世德顯承，於前代陵寢繕完保護，禮從其厚。此次修復諸明陵殿宇等工，節費至百萬帑金，亦所不靳。所有此項工程，著派尙書劉墉、德保、金簡，侍郎曹文植、德成董率經理，務期完固。工成後飭該地方官，隨時稽察，小心防護，嚴禁樵蘇，用副朕隆禮勝朝之至意。<sup>19</sup>

由《實錄》所載，可知乾隆將天壽山明陵的破損不堪，歸因於明代中葉以後，國事廢弛，全不以祖宗爲念，於陵寢並未修葺。且經流寇擾亂，亦無人守，以致日就傾圮。並表明對燬金陵與清朝有深仇的神宗定陵僅撤去享殿，停其祭祀。明樓寶城，仍存其舊未壞。且出於睿親王多爾袞所爲，非世祖之意。顯然有意掩飾清廷開國以來一百四十年間，未對明陵進行有效維護的事實。直言之，清廷對天壽山陵園只是消極保護，而非積極維護。影響所及，長期以來地方官並未小心稽查，以致殿宇損漏。牆垣欹側之處甚多。<sup>20</sup>

自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至五十二年（1787）三月，歷時兩整年，清廷對明朝天壽山陵寢從事大規模的修繕。乾隆的修葺工作，揀派大臣監督，除對建物加以修建，也在陵區廣植林木，工程要求「一律堅整」，共計使用帑金廿八萬六千餘兩。重修工竣之日，乾隆親臨閱視，眼見「殿宇煥然，松楸如舊」。爲免「閱時既久，地方官查禁不力，復不免有私行樵採，及殿宇牆垣間被風雨損壞等事。」下令「嗣後應交直隸總督，責成霸昌道就近專管稽查。仍於每年十月，著工部屆期奏請。派該部堂官一員，前往查勘，如有殿宇牆垣樹株傷損等事，惟該管道員是問，以示朕加禮勝朝保護舊陵至意。」<sup>21</sup>

<sup>19</sup>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1226/3a-5b，乾隆五十年三月甲寅條。

<sup>20</sup>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1276/12b，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丙子條。

<sup>21</sup>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1276/12b-13a，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丙子條。有關乾隆修繕天壽山明陵事宜，可參閱胡漢生，〈清乾隆年間修葺明十三陵遺址考證－兼論各陵明樓、殿廡原有形制〉，

乾隆對重修的明陵採取每年由工部查勘的做法，若能切實執行，應能頗有成效。五十四年底工部查勘回奏，「明陵各處殿宇尚屬整齊潔淨，惟牆垣紅灰及門扇油飾，間有脫落」，請將昌霸道交部議處。然而，乾隆的處置卻頗耐人尋味。他認為：「明陵牆垣門扇灰飾間有脫落，自係風雨損壞。該道未及隨時修理，祇須罰令賠修，免其交部議處。」而且改變了原先每年查勘的規定，「嗣後派往查勘之工部堂官，著三年奏派一次」。<sup>22</sup>乾隆雖有保護舊陵之意，卻對陵寢的查勘轉趨寬鬆，大規模的修繕與嚴格的查勘，不過一時之舉，意在博取優禮勝朝美譽。

乾隆之後，清朝盛世不再，無力再進行全面的修繕工程。修繕雖不易，查勘工作則從未間斷。由《實錄》記載咸豐八年（1858）底的查勘結果，可知經歷七十餘年，寶城殿宇等項舊工，均尚完固。惟牆垣紅灰瓦片間有脫落之處，由霸昌道陸續黏補；樹株未能茂盛，責成各陵戶加意培護。並令該地方官隨時稽察，嚴禁採樵。咸豐的處理，意在表示其加禮前朝之至意。<sup>23</sup>光緒年間，延恩侯誠端奏民眾開墾明代陵寢宮牆左右地畝十數餘頃之多，並有砍伐樹木情事。經查勘屬實後，墾地已侵占明堂正路，實屬不成事體。遂訂定章程，規定所墾地畝有在一百步以內者，一概騰出，永遠封禁。並責成該地方官隨時稽查，不准再有墾種情事，並嚴禁砍伐樹株。然所謂私墾一事，後經進一步查驗，各戶均領有契紙，議糧升科，並無私墾蒙混影射情弊。實係誠端屢向州民勒交私租，任意訛索，並自行革充陵戶，收地取租，反控他人侵種。因此變通辦理，議定界限章程，界限以內墾種之地一律騰出封禁，以資保護。如再有越墾情事，即將該知州嚴行議處。清廷在處理明代陵寢相關之事，唯一的原則是「用副隆禮勝朝至意」，<sup>24</sup>這正是清朝統治者三百年明陵政策始終一貫體現的情懷。

---

《建築歷史與理論·第5輯》（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史學分會編，楊鴻勛·劉托主編，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頁35-44。

<sup>22</sup>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1342/16b-17a，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戊子條。

<sup>23</sup> 《清文宗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1月第1版），271/6a，咸豐八年十二月乙巳條。

<sup>24</sup> 《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5月第1版），119/9b，光緒六年九月甲戌條；129/19b-20a，光緒七年四月丙辰條；143/27b，光緒八年二月壬午條；148/10a-10b，光緒八年六月甲戌條；149/20a，光緒八年七月庚子條。

### 三、明思陵的營建

明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逼近北京，崇禎帝於三月十九日自縊煤山，竟遭暴屍之辱。直至三月廿五日，大順政權順天府官李紙票與昌平州官吏商議開壙事，決定開田妃壙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時州庫如洗，由郡中好義之士及資完成開壙安葬事宜。<sup>25</sup>

李自成之舉，在明朝子民的眼裡就是「闖賊逆變，逼殺君后，荼毒生靈」，<sup>26</sup>為君父不共戴天之仇。此種心理清人十分了解，一入關進入北京，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就為崇禎發喪，諭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值得注意的是，服喪期滿，「除服後，官民俱著遵制薙髮」。<sup>27</sup>清朝的薙髮在北方未引起如在南方激烈的反抗，或與為崇禎發喪，博得明朝子民相當的好感有關。至少，從多爾袞的諭令，可知清廷有意也很技巧的將薙髮與為崇禎發喪結合在一起。如此做法，自然使清廷為崇禎發喪帶有濃烈的政治意涵。

崇禎帝雖入土，陵寢規制未備。順治元年五月，多爾袞下令禮葬崇禎帝后，仍造陵墓如制。<sup>28</sup>多爾袞的諭令有極重要的指標意義，意味清朝擬將以皇帝之禮處理崇禎相關事宜。六月，遂有臣工獻策，請議崇禎廟號，以彰顯清朝厚德。<sup>29</sup>十月，原任司禮監太監曹化淳也上疏奏請安厝崇禎帝后，改名為陵。「今擬開厝，先帝居中，先后附左，田妃附右。其上舊用寶城合擬培土為頂，除陵前量造享殿三間以奉神主外，仍立碑鐫號，用昭德意。」<sup>30</sup>順治初崇禎陵的改建，大體依此原則進行。田貴妃墓因緣成為崇禎帝的萬年吉壤，妃墳改建成為帝陵。

<sup>25</sup> 佚名，《明諸陵圖說》（清抄本，上海圖書館藏），第一冊，〈輸葬崇禎帝后申文〉，順治十六年趙一桂申。

<sup>26</sup> 佚名，《明諸陵圖說》，第一冊，〈思陵獻俘奏啓〉，密雲副將張誠奏。

<sup>27</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5/2b，順治元年五月辛卯條。

<sup>28</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5/6a，順治元年五月己酉條。

<sup>29</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5/15b，順治元年六月庚辰條。

<sup>30</sup> 佚名，《明諸陵圖說》，第一冊，〈請安厝崇禎帝后改名為陵并合葬懿安皇后於德陵疏〉，順治元年十月原任司禮監太監曹化淳題。

崇禎帝的安葬與陵寢的興造，都是在多爾袞攝政時期完成的。順治親政後，感於「故明崇禎帝尙爲孜孜求治之主，祇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亂，身殉社稷。若不亟爲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用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憫惻之意。」<sup>31</sup>命大學士金之俊撰文勒碑，立於崇禎帝陵前，其文爲：

皇清敕建明崇禎帝碑記。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中和殿大學士臣金之俊奉敕恭撰。臣嘗觀古今治亂之蹟，邦國興替之由，使後之人得而攷焉，以爲法戒者，其義莫詳於史。大約國之興也，創業開基之君，莫不有應天順人之舉。積功種德，爲累葉之所憑藉。其亡也，必末世之主，或天資刻薄殘民以逞，或黯弱昏庸太阿旁落，或甚而縱欲敗度滅裂綱常，種種失德，難以枚舉，皆有自取滅亡之道。即國祚之修短不同，而覆敗相尋，異世一轍。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非虛語也。我皇上聰明睿智，典學惟勤，涵泳六經之暇，尤研精史書。舉前代之是非，往事之成敗，靡不溯原窮委，一一究其指歸。而於明朝興亡本末，更瞭如指掌。於是，深晰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者，厥咎有在，非末世亡國之君可同年而語也。但當時既無實錄，日後慮多傳疑，每廬睿懷之憫惻，於順治十四年二月內爰諭工部立碑表章，恭繹天語。一則曰：明崇禎帝尙爲孜孜求治之主，祇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亂，身殉社稷。再則曰：若不亟爲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嗚呼！宸鑒及此，不能不令人低徊歎息，頌我皇上之明並日月，發幽光於幾沉。德邁興王，昭公評於隔代，真前此紀載中未有之盛事也。茲工部遵諭，礲石成，皇上特命臣之俊爲文，以勒之碑。臣係故明纍臣，矢殉溝壑，幸邁永清之會，再續餘生。既捧徽綸而感涕，益驚專命而徬徨。以讜陋昏耄如臣，何能追闡遺嫩，仰副皇上表章之盛心。然不敢不就見聞所及，謬述其概，以竊附史官之職也。按崇禎帝本以英敏之資，潛德藩邸，繼膺大統。當即位之始，正孽璫煽亂之餘，

<sup>31</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07/4a，順治十四年二月甲申條。



中外危疑，獨能不動聲色芟夷大憝，如秋風振槁。因目擊人心蠱壞，盡屬如醉如夢之流，法紀廢弛，釀成不痛不癢之習，銳意更絃。猛圖法祖，恤民隱，畏天災，嘗蔬食布衣，痛自貶損。講帷之咨詢不輟，平臺之召對屢勤。一段宵旰，靡寧想望太平之意，誠有如上諭所云孜孜求治者。假令當日有先憂後樂之臣，同心一德，匡濟時艱，小康猶可坐致。即或中材之佐，警戒綢繆，尙得彌縫歲月。其如怙媮積玩，貪黷成風，下吏之精神專用以鑽營結納，大僚之好尙惟在乎位高多金，以致民窮盜起。然發難之初，不過西陲一隅，亦何難以國家全力制之，而上下相蒙以賊爲諱。嘯聚之勢，日熾月盛。攻城掠邑，有同破竹，然後舉國張皇，紛紛議選。將議抽兵，議加派，議設總理總督重臣，臨渴掘井，毫無成算。以言剿，則挫屢聞；以言撫，則招徠無術。至於驕兵悍將，反借賊勢披猖爲護身符，來不能禦，去不肯追，遂蔓延流毒，秦晉楚豫巴蜀暨大江以北，所在騷然。而朝端之上，方爭洛蜀之黨，日構玄黃之戰，厝火怡堂，獨以賊遺君父憂。間有一二耿介特立之士，以公忠體國爲念，又往往不安於其位。一時內外文武，事權在握者，無一實心辦事之人矣。致令仁明銳治之主，不幸而丁中葉陵替之後，起弊扶衰，萬難措手。兼之子然孤立於上，四顧盈庭，茫無可倚。譬如尙羸之夫，病之初中尙在膚膜腠理之間，中醫猶能按脈而治。及耽延日久，深入膏肓，雖有盧扁，救療安施。豈非天之所廢，莫能興之；而人謀不臧，適任其咎者耶。攷史傳所載，凡末世亡國之君，覆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嗟乎傷哉，有君無臣，禍貽邦國，竟若斯哉，此明代往事之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我皇上深用憫惻，而欲急爲之闡揚，是即孔子當年作春秋之心，褒貶出乎至公，瑕瑜毋令相掩，俾天下後世讀明史者咸知崇禎帝之失天下也，非失德之故，總由人臣謀國不忠所致。庶後之爲人臣者，悚然知所戒，而後之爲人君者亦知慎於用人也已。然則煌煌睿諭，明乎制治保邦，勿玩小寇。而弭寇必以安民爲本，安民則又以知人爲本，此匪直昭一時之信史，實著萬世之常

經，蓋永爲君若臣民寶鏡哉<sup>32</sup>

清爲亡國之主營建陵寢，已屬曠世之典。開國之君，又爲勝朝末代之主立碑，尤有不容忽視的意義。明代天壽山十三陵，除長陵之神功聖德碑有文字外，其餘皆爲無字碑。崇禎爲亡國之主，多爾袞營建思陵，並未如他陵建有神功聖德碑亭。順治立碑有兩層意義：一爲完備陵寢規制。一爲以君權行使春秋史權，定前朝是非。順治雖爲崇禎立碑，然不親製碑文，以免過度尊禮勝朝。以明之降臣大學士金之俊代爲撰文，可使未能死節的前朝遺臣在面對殉國故主之時，產生一種難以言諭的複雜之心，進而更盡忠新朝。金之俊爲史官，碑文也由史立論，肯定崇禎的政績及歷史地位。立碑之後，順治也親祭或遣大臣致祭崇禎。並予崇禎諡號，爲莊烈愍皇帝。<sup>33</sup>

清廷除了禮葬崇禎外，對從君陪縊的太監王承恩，也賜塋域一區，「使後世知艱危之際，內員中乃尙有忠烈而死如承恩者。」與崇禎相較，王承恩墓有兩座立碑，分別立於順治二年（1645）與十七年（1660），碑文都是出自順治御製。順治用心十分明顯，乃在勸忠，「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慕誼無窮也。」<sup>34</sup>

順治尊禮崇禎及王承恩的方式，實具有及重大的意義，此後乾隆「以史御漢」的諸種做法，順治已經開其先聲。

#### 四、清帝親謁明十三陵與乾隆題明景帝陵詩句

清廷的明陵政策，最崇高的優禮做法，表現在皇帝親謁明代帝陵。順治十六

<sup>32</sup> 碑文見胡漢生，《明十三陵》（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1月北京第1版），頁412-414。惟胡著爲簡體字，另參考《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24/4b-7b，順治十六年三月丙午條。標點之使用，不盡與胡著相同。

<sup>33</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30/3b，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壬申條；130/4b-5a，順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條；130/7a-7b，順治十六年十一月甲申條；131/7a，順治十七年正月癸酉條。

<sup>34</sup> 胡漢生，《明十三陵》，頁414-416。另據《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3812a-14b，順治十七年七月辛巳條，順治命大學士李蔚撰明死節太監王承恩碑文，表於其墓。此文不見於胡著。關於思陵旁王承恩墓，亦有認爲所葬非王承恩者，參見劉仲孝，〈王承恩墓不在明思陵〉，《紫禁城》，1996年第1期，頁26-27。

年（1659）十一月壬申，世祖車駕過崇禎帝陵，悽然泣下，酌酒於陵前，<sup>35</sup>雖與正式行謁陵之禮有別，但應可視為清帝謁明陵之始。翌年，順治幸昌平州，又有觀故明諸陵之舉。<sup>36</sup>

康熙繼之，十四年（1675）九月幸天壽山，率諸大臣侍衛致奠長陵，其餘諸陵（定陵除外）遣內大臣等致奠。<sup>37</sup>十五年（1676）十月，幸昌平，過明十二陵（定陵除外），仿順治於崇禎陵前酌酒之舉，一一躬親酌酒。翌日復遣內大臣至故明十二陵前，分別宣文致祭。<sup>38</sup>

乾隆於四十九年（1784）第六度南巡之後，以祖父為法的乾隆心知此後不會再有南巡之舉，也意味者不會再親謁明太祖陵。結東南巡與拜謁明太祖陵的乾隆，立刻轉移謁陵對象，將目標瞄準天壽山的明陵。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諭令將親詣謁明成祖長陵。在諭令中，乾隆明白表示「至昌平為永樂以後諸帝陵寢，非若江寧孝陵可比。此次親詣長陵奠醑，其餘諸陵，均遣隨從之王大臣前往致奠。」<sup>39</sup>由此可見，在乾隆的眼裡，明十三陵的地位遠不如明孝陵。

翌月，乾隆前往昌平致祭明長陵。謁陵之後，如前所述，對天壽山明陵進行全面的修復，對神宗定陵亦採優禮政策，一如其他各陵。乾隆五十年天壽山之行，乾隆有兩篇感懷之作：〈謁明陵八韻〉及〈哀明陵三十韻〉。修葺明陵工玩，乾隆臨視，五十二年（丁未，1787）又有御製詩之作。〈哀明陵三十韻〉及五十二年御製詩，分別鐫刻於「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之背面及左側。其後，往承德避暑，途中嘗作〈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這五篇乾隆御製，是觀察乾隆明陵（昌平十三陵）情懷的重要文獻。

〈謁明陵八韻〉是乾隆謁天壽山明陵首篇之作。強調大清入主中國係「得之賊手」，「驅除本是藉餘閏」，且「經百餘年而德怨久泯」，清對朱明後代優

<sup>35</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30/3b，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壬申條。

<sup>36</sup>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40/10b，順治十七年九月戊寅條。

<sup>37</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8月第1版），頁224-225，康熙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己丑條。《清聖祖仁皇帝實錄》，57/12a-12b，康熙十四年九月己丑條。

<sup>38</sup> 《康熙起居注》，頁275，康熙十五年十月初九日戊午條；初十日己未條。《清聖祖仁皇帝實錄》，63/13a，康熙十五年十月戊午條。

<sup>39</sup>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1225/9a，乾隆五十年二月壬寅條。

以封侯，並採保護明陵政策，惟殿堂多頹圮，故「發重帑而賁飾」，至於明朝曾毀房山金代陵寢，乾隆也認為「當忘彼愆毀其金」，「惟凜天之難諶，假茲殷鑒」，藉此體認天命靡長的道理。<sup>40</sup>直言之，乾隆五十年的天壽山謁明陵，及大修勝朝陵寢，是在對明清之間的歷史恩仇作一了斷。就乾隆而言，自認是懷著寬大氣度，示人以廣，忘卻明朝曾毀金陵的仇怨。惟乾隆將〈謁明陵八韻〉勒於明長陵內碑亭清世祖順治十六年保護明陵禁樵採諭旨碑的背後，似有不讓順治專美於前的用意。

兩個月後，<sup>41</sup>乾隆又有〈哀明陵三十韻〉之作，此篇竟以「哀」字為名，通篇不是在表現尊禮勝朝的情懷，而是論十三陵的選址與營建，基本上是一篇明十三陵簡史。乾隆首先就駁斥擇定天壽山為壽域出自臣下或形家之說，認為是「永樂獨銳意用黃土山」，盛讚永樂「英雄具眼自非常」。批評永陵、定陵之侈飾，壯麗精緻過於長陵，「忘其前世艱開創，徒計身後胥堪輕」。連田貴妃園寢地宮陳設都頗雄壯，「一妃之費已如此，餘諸帝者可知矣」。對長陵以下諸陵的有碑無字，乾隆也深為不解。通篇也強調明陵自明中葉以後怠棄不修，荒蕪不堪，「不忍再視命修葺」，「俾一律堅整完固，重設神主，以時祭祀」。<sup>42</sup>〈哀明陵三十韻〉作成後，勒於〈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的背面，頗有勢壓勝朝的意味。

五十二年（1787）修葺明陵竣工，乾隆臨視，前一日駐蹕湯泉，撰〈湯泉行宮即事〉詩一首。重申五十年〈謁明陵八韻〉之意，以明代為鑑，察興亡之跡。詩云：

紆路明陵閱，沼宮取便停，落成宛此日，題主妥前靈。惟是興亡跡，  
敢忘鑒戒型，曾書讀召誥，撰此俾聰聽。

<sup>40</sup> 《（乾隆）御製詩五集》，14/1a-2b，〈謁明陵八韻〉。

<sup>41</sup> 由勒石於「明長陵龍趺碑」及「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的碑文，可知〈謁明陵八韻〉作於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季春月上浣，〈哀明陵三十韻〉作於同年仲夏月中浣。見胡漢生，《明十三陵》，頁408、411。

<sup>42</sup> 《（乾隆）御製詩五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版），16/22b-24b，〈哀明陵三十韻〉。

乾隆自己註解說明詩意云：

昌平明代諸陵，久爲流寇殘毀，今又閱百數十年。乙巳春親臨閱視，不特殿廡傾圮，即木主亦不知何時爲人竊去。惕然傷之，因命發帑金，飭大臣董司其事，爲之修葺，一律完整。並重題神位供奉，以妥前靈。茲以工竣，因迴蹕紆道駐此，明當重臨瞻閱。（前四句）前歲駐此，因謁明陵，益凜天命難謀，殷鑒不遠。因著讀召誥一篇，於顧畏民彝，祈天永命之道，三致意焉。庶我萬世子孫聰聽毋忘，以爲保世凝承之本耳。（後四句）<sup>43</sup>

翌日，往天壽山臨視，又有〈修明陵成遂因臨視用乙巳詩韻〉之作，詩云：

前王闕寢自成古，後世葺陵原賴今，本有十三邱壑列，不無頹廢歲年深。乙之春命重修飾，丙至冬成此視臨，榱桷煥然已盈目，憑依復矣爲驚心。可知世主違天眷，乃致蒼生嘆陸沈，構築教掄虞部吏，庸賃那惜地官金。斯來慶落慨興廢，言返迴？遠壑林，一再留吟匪誇□，難謀畏志勵恒謀。

乾隆註解此詩云：

明崇禎末，昌平諸陵爲李自成殘毀，不獨龕帳全無，神主亦不知何時被人竊去。今既爲修葺，並令重立神主以妥享祀。前歲親詣明陵，見其簷瓦落地，榱桷傾圮。蓋自明中葉以後，怠棄不修者已一二百年。

<sup>43</sup> 《御製詩五集》，30/22b，〈湯泉行宮即事〉。

既又經流賊兵燹，至今則三四百年，是以殘廢若此。因特派大臣等董其事，派司員通行修葺，一律堅整，計用帑金二十八萬六千餘兩。其支取戶部之顏料，工部之木植，不與焉。<sup>44</sup>

觀乾隆謁陵諸詩，基調一致，都是深歎明陵自明朝中葉後即失修，又經流寇殘毀，傾圮已甚。遂命官修葺，煥然一新，並重立神主以妥享祀。雖說乾隆重修明陵確有崇禮勝朝之意，且其作法為歷代所無，應可視為一代盛典。然先後所作之詩，除對明成祖遷都北京選擇天壽山為壽域加以讚許外，皆是盡數明陵傾頹之失，並要子孫以明代興亡為殷鑑，若將乾隆行事與乃祖康熙之於明孝陵相較，誠不可以道理計。

堪稱乾隆有關明陵詩文的鉅製，當推〈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是篇為五十二年（1787）乾隆前往承德避暑山莊道經清河（位於北京與昌平之間），北望明陵有感而作。此詩有序：

六度南巡，洪武必瞻，廟貌近茲，北眺永樂，一奠椒漿。定鼎燕京，排衆議而具卓識。秘衣天壽示百載，更有深謀，即異代不能不為護持。故乙年是臨，是興感慨，飾新葺舊，爰命水部之臣發價僱工，不惜地官之帑。逮去冬，乃葺事，視季春以落成。曰廢曰興，都關法戒；為恩為怨，總拊虛無。蓋自上澣迴鑾，遇閒每以成什。逮茲避暑啓蹕，竣詠遂以登篇。憶前載度此橫杠，哀明陵曾有長句，值今日縱觀遠麓，思殷鑒可無各題，不拘一律而成，近體或古風胥據真踪，即倣昔巡書新帙。<sup>45</sup>

序言中「秘衣天壽示百載，更有深謀，即異代不能不為護持」之論，可知乾隆維護修葺明天壽山陵寢，似為不得不如此之舉。乾隆的明十三陵情懷，是「曰廢曰

<sup>44</sup> 《御製詩五集》，30/22b-23b，〈修明陵成遂因臨視用乙巳詩韻〉。

<sup>45</sup> 《御製詩五集》，32/20a-20b，〈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序」。

興，都關法戒；爲恩爲怨，總拊虛無。」總結明清之間歷史上的恩恩怨怨，並藉明陵觀朝代的興廢以爲殷鑑。

立意既如此，此篇之作有十三首詩，明朝葬於天壽山的皇帝每位一篇，以詩作評論明帝施政得失。論及明成祖，推許爲「英雄」。並謂：「若明太祖乃有能爲者，故成祖畏而弗敢即動，以待後日。然使太祖弗聽劉三吾之言，立成祖爲太子，亦可無靖難之禍矣。」<sup>46</sup>立論如此，乾隆不具史識，且對明太祖不是十分推崇。論神宗，竟謂「明帝鮮善政，然或一二有，茲今論定陵，乃無一可取。」<sup>47</sup>簡直是對明朝君主之施政持幾乎否定的看法。年近八十的古稀天子，以文字惡評明代君主，乾隆的明陵情懷不是崇禮勝朝，而是睥睨前代，要以時君定前朝是非，乾隆要扮演的仍是歷史判官。<sup>48</sup>

乾隆的明陵情懷，另外值得探究的是他對明景帝陵的「情有獨鍾」。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因自圓明園幸香山，經過景帝陵，見「明樓寶城之制全無，圍牆碑亭已頽廢不全」，不免「惻然興感」，乃命有司略爲修葺禁樵採，並作〈經金山題句〉抒感。詩云：

尺布淮南自古傷，南宮西內兩相當，奉迎業未符興慶，割裂差惟勝靖康。  
公主墳園隣薄厝，椽人壙穴詔深藏，十三陵尙輸華侈，何況相仇肇闢牆。

乾隆雖認爲景帝用于謙，不爲南渡之舉，宗社得以保全，未始無功。然而闢牆之際，實景帝自招之。死後薄葬，實咎由自取。<sup>49</sup>

三十四年（1769），乾隆又有〈題明景帝陵〉詩句，詩云：

遷都和議斥紛陳，一意于謙任智臣，挾重雖云祛恫喝，示輕終是薄君親。

<sup>46</sup> 《御製詩五集》，32/21b，〈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

<sup>47</sup> 《御製詩五集》，32/29a，〈過清河望明陵各題句〉。

<sup>48</sup> 何冠彪，〈論清高宗自我吹噓的歷史判官形象〉，見氏著《明清人物與著述》，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96年12月台灣初版1刷，頁146-182。

<sup>49</sup> 本段所述及引文，見《御製詩二集》，18/24a-24b，〈經金山題句〉。

姪隨見廢子隨棄，弟失其恭兄失仁，宗社未亡真是幸，邱明誇語豈為淳。

此詩之後附有按語：

按景帝任于謙排羣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於宗社。獨是英宗還國，僻處南宮，事同禁錮。而廢后易儲，有貪心焉。天道好還，子亦隨死，終於殺禮西山，實所自取耳。然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尺布之譏哉？至於于謙社稷為重之言，蓋出於呂飴甥喪君有君，及公孫申為將改立晉必歸君之意，後世迂儒，無不以是為韙。夫君猶親也，親為人執，為子者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以示不急，其可乎？！則意欲之獄亦有由來，或猶以為非英宗意，是真不識事體者之言耳。然則當時宜從和議乎？曰：不共之讐，安得與和？繕甲治兵以從其後，如岳飛之力戰迎二帝，天下其誰非之。<sup>50</sup>

此詩承續十五年之作，責景帝薄君親，廢后易儲，失弟恭之道，其下場全是咎由自取，貶辭多於褒語。乾隆論古人古事，頗為偏頗；且將于謙社稷為重之言，歸於呂飴甥與公孫申語意，更暴露了乾隆歷史知識的寡聞。<sup>51</sup>如此的詩文，乾隆竟將其鐫刻於明景帝陵前的「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碑」的背面，朱祁鈺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乾隆〈經金山題句〉作於十五年，〈題明景帝陵〉作於三十四年，早在謁天壽山十三陵之前（五十年），觀乾隆之於明景帝，當可知道其人的「明十三陵情懷」其來有自，實由「明景帝陵情懷」發其端，一脈相承，喜作歷史之論，自以為公正客觀，實則欠缺史識，賣弄之間盡失對勝朝的尊禮與敬意。

繼乾隆之後，嘉慶於九年（1804）三月，謁明長陵，躬行酌奠禮，並遣大

<sup>50</sup> 御製詩三集》，83/10a-11a，〈題明景帝陵〉。

<sup>51</sup> 晏子有，〈乾隆題明景帝陵詩〉，《紫禁城》，2003年第3期，頁37-39。



臣分詣諸陵行禮。此時去乾隆重修明陵不到二十年，嘉慶所見是「明樓享殿，規制煥然；嚴禁樵蘇，松楸無恙」的景象。嘉慶再申禁例，「著該地方官以時飭令守陵人戶敬司灑埽，並嚴禁砍伐樹木，永遠遵奉，無得懈弛。以副朕恪守前謨培護勝國陵寢至意。」又以前明後裔延恩侯朱毓瑞為散秩大臣，賞看守明陵人銀。來到勝朝陵寢，「憑眺山陵，彌深殷鑒」，遂作〈明陵紀事〉，文曰：

明十三陵在昌平天壽山，我朝定鼎後，代為保護，申禁樵採，恩禮之隆，自古未有。皇考特發帑金，一律修葺。朕纘承遺志，親來叩奠。遍瞻榱桷式煥，松柏舒榮，益欽聖德之高深，彌凜守成之不易。殷鑒不遠，天命靡常，惟日孜孜，猶恐有失。勤政實為君之大本，怠荒實亡國之病源，可不慎其幾與。夫明代諸君，洪武、永樂皆大有為之主。中葉以後，荒淫失德者鮮，亦無暴虐放恣諸弊。然其大病，則在於不勤政，耽宴安。夫不勤，則上不敬天，下不愛民。人君為天之子，不敬則不孝，不孝之子，天必降罰。人君為民之父，不愛則不慈，不慈之父民必愾之。天罰民愾，國事尚有為乎？前明亡於宦官，固不待言。然深信宦官之故，亦由於怠惰偷安，不親朝政，使此輩乘機弄權。而外廷臣工，君門萬里，抱忠者徒上彈章，儉壬者競圖富貴。上下不交，遂成傾否，不可救藥矣。嗚呼！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失德，而亡於神宗之怠惰，天啓之愚騃。雖係流賊作亂，而亡於宦寺之蒙蔽。蒙蔽之來，總由於君心不正。耽逸厭勞之君，始則明知蒙蔽而甘受，繼則入其術中而不覺矣。欲免臣下之蒙蔽，必先克勤政事，不自暇逸，宵小烏能施其伎倆哉！丹書曰：敬勝怠者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古聖先賢，孰不以是為亟。敬怠之幾，繫於治亂；勤惰之別，驗於安危。茲謁明陵，思及明亡之由，由於君心之怠忽。以致群小乘機，內外蒙蔽，遂淪於敗。予敬守慈訓，曷敢稍忽萬幾之繁，宵旰治理，庶幾常承天眷。永保天命，以鞏固我大清億萬年丕丕基。時以怠忽之戒為戒，

勤敬之心爲心，則政無闕失，民隱上達，予深信此理之不爽。書之自警，永綏我皇祚，可期郅隆之世，無疆之庥，敢不勉諸。<sup>52</sup>

乾隆謁明陵，賦詩感懷，意在「即故寢園示明監，靡長天命凜難諶」。嘉慶稟承乃父意旨，以明代歷史闡釋「殷鑒不遠，天命靡常」之道。甚至也仿其父作〈謁明陵八韻〉，詩云：

請兵雪恨逐流賊，正位中華大統彰。代謝應天泯德願，敬勤御極鑿興亡。封侯布惠祖恩浩，發帑修陵考澤洋。嚴禁採樵仍守護，重新闕殿免殘荒。至今未絕春秋祀，稽古孰存典籍詳。鍾阜曾瞻龍虎踞，壽山始睹檜松蒼。漫論形勝皆陳迹，益感廢成飭大防。酌殿階前衷倍凜，求安圖治念苞桑。<sup>53</sup>

嘉慶甚至如同其父，將〈明陵紀事〉鐫刻於「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之右側〈謁明陵八韻〉鐫刻於長陵陵宮「聖蹟碑」的左側。<sup>54</sup>表示繼承父志，與父親之作相互輝映傳之永遠，更可顯出比父親多一些尊禮勝朝的意思，更具仁厚之風。

嘉慶二十五年（1820），清仁宗在位的最後一年的三月，又再度前往天壽山，並至長陵、景陵、泰陵奠酒，之所致祀景陵、泰陵，乃「因念明弘治、宣德二陵俱列祀典，即與永樂陵一同躬臨奠醑。」此次謁陵，嘉慶依往例閱視陵寢，只見「視榱桷牆垣，規制煥然，松楸亦屬葱鬱」。嘉慶自豪的說：「皆由我朝列聖德侔天地。優待勝國。實爲從古所未有。」並諭令：「我萬世子孫。允當恪遵成憲。祀事時修。以副祇守前徽，恩禮前朝之至意。」<sup>55</sup>「祇守前徽，恩禮前朝」八字，正是嘉慶明陵情懷的最真實的寫照。

<sup>52</sup>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127/8a-10b，嘉慶九年三月壬寅條。

<sup>53</sup> 胡漢生，《明十三陵》，頁411-412。

<sup>54</sup> 胡漢生，《明十三陵》。頁141。

<sup>55</sup>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368/4a-5a，嘉慶二十五年三月乙丑條。

仁宗之後的宣宗，也有謁天壽山明陵之行。道光十六年九月，就諭令內閣將於十七年三月閱視明陵。<sup>56</sup>十七年三月，宣宗詣明陵行禮致祭，《實錄》記其事說：

上詣明長陵、獻陵、泰陵、景陵、永陵奠酒。諭內閣：本日朕親至明成祖等五陵酌奠，並遣大臣分詣諸陵行禮。憑眺山林，松楸無恙。敬念皇祖高宗純皇帝特諭重修，規模煥若。皇考仁宗睿皇帝兩次親臨酌奠。朕仰紹前謨，特行親祀。凡茲林木葱鬱，殿宇巍峩，皆由我朝列聖德侔天地，以時培護所致。朕鑾輅經臨，再申禁例。著該地方官飭令守陵人戶，敬司灑掃，嚴禁砍伐樹木，永遠無懈。用副朕祇守前徽，加護勝國陵寢至意。<sup>57</sup>

觀宣宗之行事與心志，與嘉慶無異，惟未有文翰，或因無處可再鐫刻之故。兩位君主雖皆是守成之主，但能屢申禁令，並親自謁陵，對明陵的保護應起了積極的作用，道光謁陵去乾隆修葺陵寢已達半世紀之久，仍能「林木葱鬱，殿宇巍峩」，清廷在中葉時期，確實透過加護陵寢落實了自順治以來隆禮勝朝的政策。

道光之後，清朝國事陵夷，自無暇於勝朝陵寢，帝王不再謁陵，但由前述，可知仍不時查勘明陵，勉力於勝朝陵寢的保護。

## 五、明遺民與清代士人的明陵書寫

由於清廷對明陵採取保護政策，清帝又謁陵致祭，職是之故，清初以遺民自居思念故國的人士每能進入陵區藉謁陵表達對故國最深沉的思念。其中，最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顧炎武。

顧炎武曾七謁明孝陵，六謁天壽山諸陵（後四次是拜謁崇禎攢宮），謁陵次

<sup>56</sup>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288/6a，道光十六年九月甲申條；288/20b，道光十六年九月乙未條。

<sup>57</sup>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295/21b-22a，道光十七年三月丙申條

數之多，居明遺民之冠。謁陵之後，必有詩文抒懷，甚至有〈孝陵圖〉及《昌平山水記》之作，毫不保留的表露對故國陵寢的情懷。茲據顧氏詩文集，亭林的最後廿五年，多居北方，期間六謁天壽山陵。六次謁陵時間為：

- (1) 明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年四十七。首謁天壽山，作〈恭謁天壽山十三陵〉、〈王太監墓〉。
- (2) 明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四十八。再謁天壽山，作〈再謁天壽山陵〉。
- (3) 康熙元年（壬寅，1662），三謁天壽山，年五十。此後皆有事攢宮，作〈三月十九日有事于攢宮，時聞緬國之報〉。558
- (4) 康熙三年（甲辰，1664）四謁天壽山，年五十二。作〈孟秋朔旦有事于攢宮〉。662
- (5) 康熙八年（己酉，1669），五謁天壽山，年五十七。作〈三月十二日有事于攢宮，同李處士因篤〉。749
- (6) 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六謁天壽山，年六十五。作〈二月十日有事于攢宮〉。879

顧炎武首謁十三陵，作長詩〈恭謁天壽山十三陵〉，盛讚陵寢的宏規，如同先前謁明孝陵所作之〈孝陵圖〉，均為描述陵寢規制之作。「此篇敘述簡要有法，刻寫質朴無華，不排不比，亦文亦詩，七十韻無一湊泊，七百字不嫌辭費，真乃亡國之臣，痛極呼天，不煩雕琢者也。」<sup>58</sup>謁罷十三陵後，又至崇禎陵旁之王承恩墓，作〈王太監墓〉，表彰從死之大節。<sup>59</sup>第二次謁陵之前，順治皇帝才閱天壽山明陵，敕令嚴加保護，並遣大臣祭崇禎帝。對具有強烈遺民精神的顧炎武，在第二次謁陵的〈再謁天壽山陵〉中毫不領情，寫下「空勞牲醴陳，為真神豈食？仁言人所欣，甘言人所惑。小修此陵園，大屑我社稷」的詩句<sup>60</sup>。

對一位孤忠耿耿的明遺臣而言，十三陵諸陵就屬崇禎陵最具特殊的意義。從

<sup>58</sup> 《顧亭林詩箋釋》，頁 492，「箋」。

<sup>59</sup> 《顧亭林詩箋釋》，頁 492，〈王太監墓〉。

<sup>60</sup> 《顧亭林詩箋釋》，頁 515，〈再謁天壽山陵〉；頁 516-517，「釋」、「箋」。

第三次謁天壽山陵，就只對崇禎陵致意。顧氏不稱陵，而稱「攢宮」，在《昌平山水記》中有詳細的說明「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攢宮，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故從其實而書之也」。<sup>61</sup>亭林謁陵的日期也有深意，第三次謁陵有事于攢宮，是在崇禎忌辰的三月十九日；第四次謁陵在孟秋望日，為秋祭之日；第五次則於三月十二日，為當年之清明，可見亭林「蓋忠寄哀于思宗深且厚也」。<sup>62</sup>

顧炎武之於十三陵，與之於孝陵相較，有一事大異其趣。謁孝陵作〈孝陵圖〉，十三陵之行則有《昌平山水記》之作。該書由德勝門寫起，為明代皇帝謁陵之行的起點，一路所記皆與陵寢有關與，卷上有大部分是關於天壽山及金山陵寢的記述，為顧氏實地勘查的紀實之作，也是謁陵之作。昌平即天壽山所在，以之為名，所重者即在陵寢。直言之，顧氏此作，不是狹隘的只書寫陵寢，而是述陵寢所在的山川形勝，為大格局之作。顧氏棄風水不談，而論形勢，更是難能可貴。《昌平山水記》為入清以來，明遺民對明代北京地區陵寢最早的有條理的全面記載。

顧氏《昌平山水記》雖是開創之作，卻不免失之精簡。梁份的《明帝陵圖說》則是繼顧炎武之後遺民明陵書寫的巨構。或許因為勝朝陵寢的專著仍有某些顧忌的因素，「世無刻本，各藏書家所未著錄」，<sup>63</sup>傳世的《帝陵圖說》都是抄本，各本內容及書寫次序不盡相同，然有關天壽山十二陵一攢宮及金山景帝陵的內容則完全一樣。清初遺民書寫天壽山及金山陵寢只有顧氏與梁氏之作，時人吳銘道嘗謂：

先皇帝三百年式憑之天壽山，五六十年來僅僅一二遺民於摧傷斬伐之餘，

<sup>61</sup> 顧炎武，《昌平山水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235》，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吳江潘氏遂初堂刻亭林遺書本，1996年8月初版1刷），卷上，頁11a。

<sup>62</sup> 《顧亭林詩箋釋》，頁558-559，〈三月十九日有事于攢宮，時聞緬國之報〉，「釋」、「箋」。

<sup>63</sup> 梁份，《帝陵圖說》（國家圖書館分館編，《稀見明史史籍輯存》第30冊，北京：線裝書局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2003），頁504，〈蘅溪識語〉。

撥雉兔芻蕘之跡，或得之樵人指數，或得之野老傳聞，紀成一編，以備逸史。此非有大隱慟於其中者，必不能也。歲甲申（按：康熙四十三年，1704）冬，質人（按：指梁份）遊滇，而是書適成，出以眎予，取顧氏記共相質証。因嘆有顧氏記必不可無此圖說，猶之有史記必不可無漢書。而此書斷手之年，又即天壽山結局之歲也，非偶然已。予又觀顧氏仍稱攢宮爲思宗，此當時亂臣如馬阮輩無所逃其誤國之罪，敢以惡諡蒙大行，雖議曰思，其諡猶未定。夫思乃典午之諡，劉禪煌煌明聖，忍過爲污蔑。弘光元年正月李給諫<sup>映</sup>疏爭此事，尋改諡毅宗矣。質人之言曰：諡思宗，於烈皇帝何傷？亦祇自絕而已。善哉言乎，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者也。圖凡十五，天壽山至攢宮十四圖，爲二卷；金山圖，泊景帝陵，爲三卷；虛首卷者，將有事於鍾山孝陵也。<sup>64</sup>

梁份未書寫序言，其友吳銘道的〈帝陵圖說書後〉及〈重書帝陵圖說後〉十分重要，從吳氏之文可知《帝陵圖說》稿成於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時爲顧炎武去世後廿二年，以遺民自居者已是鳳毛麟角，梁份撰成《帝陵圖說》，藉書寫陵園的歷史與規制以明思念故國之志，更無他人。顧炎武與梁份正是五六十年來僅僅之一二遺民。誠如吳銘道所言，此非有大隱慟於其中者，必不能也。

梁份《帝陵圖說》，與其說是陵志，毋寧說是一部陵史，是書之作有所謂史學的「書法」，最能說明梁氏書法的爲有關崇禎帝陵的書寫。梁氏一如顧炎武，不以思陵稱崇禎帝陵，而稱攢宮。其所持理由，除與顧炎武都是本春秋之義外，更認爲「思」非美諡。<sup>65</sup>再者，梁氏書寫攢宮，刻意而有技巧的完全不提清初對崇禎陵的尊禮勝朝措施，當然也絕不使用清代的年號。讀《帝陵圖說》「攢宮」，似乎清朝完全不存在。此種書寫的方式，正是具有強烈的遺民情懷。

再者，《帝陵圖說》雖以圖說名之，然所重者不在圖而在文字的描述。與《昌

<sup>64</sup>梁份，《帝陵圖說》，吳銘道撰，〈帝陵圖說書後〉。

<sup>65</sup>梁份，《帝陵圖說》，卷之二，「攢宮」。

平山水記》相較，「顧詳於形勢，而梁詳於規制。顧旁及山水，而實重諸陵；梁特悉諸陵，而因及陵所麗之山水。」<sup>66</sup>《帝陵圖說》第一卷鍾山全圖、孝陵圖說，有目無文，或以為「虛其首卷，將有待於孝陵之謁而後成書。」<sup>67</sup>然恐非如此，吾人試思之，康熙四十三年康熙已四度親謁明孝陵，以康熙對明孝陵的尊禮及維護，懷有濃烈故國之思的明遺民前往謁陵，應是頗難自處。虛孝陵，應是遺民最深沉的無奈。<sup>68</sup>

相對於遺民的書寫，清初人士不乏入仕清廷，但仍以陵寢寄懷者，最重要的就是成書於康熙十八年（1679）譚吉璉所撰的《肅松錄》，譚氏的原序云：

康熙戊午（十七年，1678）冬，歲將除矣，至昌平與楊子謙六詢山川勝蹟，出州志一編相示。春正元日靜坐僧寮，惟聞錚鐸梵唄聲，回視京華塵鞅，不啻萬山深處也。及讀世祖皇帝祭明陵諸宸翰，每於思陵三致意焉。夫三代盛時，虞賓再為白馬萋苴而已，若穀林蒼梧之間，屬車臨幸，興悲抔土者，則未之聞。乃世祖皇帝時巡所及，躬執椒漿，灑淚為文，并置陵監，繕宮垣，禁樵牧，忠厚惻怛，可謂至矣。百世而下讀斯文也，猶當興起，矧聰生明季，逮見聞者，與因襍被入山，謁陵摩碑，欲泣而歌，更采父老所述與州志所載，裒為一集，名肅松錄。蓋遵聖詔，以附揚休之義云爾。<sup>69</sup>

由譚吉璉的序，對照於遺民的書寫，入仕清廷官員書寫明陵，要彰顯清朝對明陵忠厚惻怛的尊崇維護之意。職是之故，《肅松錄》卷一所錄多為順治朝的敕詔、祭文、碑文等，及清朝保護明陵的令典。諸此，在遺民陵寢著作中，是絕對沒有

<sup>66</sup> 梁份，《帝陵圖說》，〈帝陵圖說書後〉。

<sup>67</sup> 梁份，《帝陵圖說》，吳銘道撰，〈重書帝陵圖說後〉。

<sup>68</sup> 本人另撰〈明遺民的陵寢書寫－梁份的《帝陵圖說》〉，將刊於耶魯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學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學系・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合辦，「中國文化研究的傳承與創新－紀念牟復禮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sup>69</sup> 譚吉璉，《肅松錄》（清康熙有恆堂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4/11a-b，〈譚吉璉序〉。

的。但是，相較於《昌平山水紀》及《帝陵圖說》，《肅松錄》的內容頗有可採，若以存一代典制而言，遠勝遺民之作。卷一的附記，錄〈明洪熙長陵神功聖德碑〉全文，為清初有關明陵著述中僅見。卷二為天壽山十三陵及康老、太子、貴妃、太監墓的規制，每個建物的大小尺寸現狀，建物間的距離，記載十分詳細，譚氏應是進行了縝密的實地調查。可由譚氏所記，了解康熙初明代天壽山陵寢的樣貌。卷三又收錄了一些有關思陵的文獻，及明人的謁陵詩。卷四則為譚吉璫所作天壽山各陵之詩，及數篇陵墓辨，附記則錄明代典籍中有關陵墓的記載，最後為譚吉璫的原序及蔣薰的後序。

譚吉璫《肅松錄》雖有清康熙有恆堂刻本，然當時可能流傳不廣，因而《肅松錄》有鈔本傳世，卷數與刻版不同，為五卷本，且內容亦不盡相同，鈔本有刻本沒有的內容。<sup>70</sup>甚至譚吉璫後裔出版的《嘉興譚氏遺書》卷五《肅松錄》，竟是由引用《肅松錄》內容的典籍中蒐錄若干記載纂輯而成，顯然譚氏子孫並未典藏先祖的著作，也未能得見《肅松錄》的刻本與鈔本。不僅此也，清康熙年間竟有與《肅松錄》內容頗多雷同，名為《諸陵圖》的抄本傳世。<sup>71</sup>《諸陵圖》應是以《肅松錄》為藍本，有所增刪而成，可視作《肅松錄》的另一個抄本。

由《帝陵圖說》及《肅松錄》的版本，或可知清初康熙年間雖不禁止進入勝朝陵區憑弔，但有關明代陵寢專著的出版，應是仍有禁忌。再者，撰於康熙年間的顧炎武《昌平山水記》、譚吉璫《肅松錄》、梁份《帝陵圖書》三書都是以天壽山十三陵為最主要的內容，箇中應有深意，蓋皆寄情於崇禎。顧炎武、梁份不稱思陵而稱攢宮，因崇禎以發揚春秋之義；譚吉璫《肅松錄》收錄了各種有關崇禎陵和王承恩墓的相關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是順治的詔諭祭文等，或許可視為以另外一種手法，藉著歌誦清朝的聖德，寄情於故國末代殉國君主。

明遺民與清代士人的明陵書寫，以康熙時期最夥，此後不見有如前所述的專著。相對於文字著述，乾隆晚年之後，有明十三陵的圖繪若干幅。傳世得見最早

<sup>70</sup> 《肅松錄》五卷舊鈔本四冊，原為中華書局圖書館藏，現為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書。

<sup>71</sup> 此書未註撰者，或名為《明諸陵圖說》，全書不分卷，兩冊，為九峰舊廬藏書，現為上海圖書館典藏。該書有譚吉璫同邑嘉興高佑鈺補輯明謁陵詩，此不見於《肅松錄》刻版，而見於抄本。



的一幅是乾隆六十年（1795）之作，此圖為設色畫，不知繪者何人。之後，有同治九年（1870）佚名所繪之設色「十三陵圖」；光緒三十四年（1908）馬綬權繪墨印著色「十三陵圖」。三圖俱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無落款。<sup>72</sup>此外，昌平十三陵特區文物科藏有清人壬錫福所繪設色「大明十三帝陵圖」。<sup>73</sup>大連市立圖書館也收藏名為「大明十三陵圖」、「明十三陵圖」的彩繪圖，前者未標作者及成圖時間，然應為清代之作；後者圖中有作者中和氏的題記，標明歲次乙巳所繪，<sup>74</sup>合理推測應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諸圖全為彩繪，表現的是天壽山陵寢的山川形勝，陵寢位置，以及與陵寢相關的各各建置，與前述圖說之著中插圖或示意式的圖繪迥然不同。

以上各圖，毫無疑問，非宮中官府之作，全出於民間人士之手，由繪事技巧觀之，應非為名家畫作，作畫之用意應與顧炎武繪「孝陵圖」相同，為寄情陵寢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其中有直書「大明」國號者，且對泰陵（明孝宗）的說明文字中年號「弘治」的「弘」，不避乾隆名諱。崇禎陵概以思陵稱之，不用攢宮。就畫作中文字的使用觀之，書法並不謹嚴，或可推知作畫者非學術根底深厚者，繪十三陵圖，意在以圖像存一代陵制，或亦可視為寄情之作。

專著與圖繪之外，以《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四庫未收》、《四庫禁燬》、《續四庫》為範圍的清人文集加以蒐羅，入清以後士人所寫的謁明陵詩文為數甚多。賦詩為文者，背景立場互異，呈現了各式各樣的情懷。惟對建文與景帝寄予無限的同情，是清人明陵情懷中殊值一提者。

建文皇帝以叔父燕王「靖難」而失國，其下落是明朝最大的疑案，傳言其晚年返回京師，葬西山（又稱西山），不封不樹。屈大均特地前往拜謁，作〈金山口恭謁天下大師墓〉：

<sup>72</sup> 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佚名製「明十三陵全圖（色繪）」（書號 074.71/20.121/1870.2/7459，登錄號 720470），為清西陵圖，非明十三陵圖。

<sup>73</sup> 此圖見於胡漢生，《明十三陵》。

<sup>74</sup> 劉鎮偉主編，《中國古地圖精選》（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頁26，圖23「大明十三陵圖繪」；頁76，圖76「明十三陵圖」；頁89、97，有關兩幅圖之圖版說明。

讓帝飄零海嶠東，龍歸猶識未央宮，風雷豈敢疑周旦，禾黍何當怨狡童。  
父老爭迎靈鷲錫，山河如棄鼎湖弓，傷心陵墓無封樹，秋草離離白露中。

天下大師墓真假難知，身為遺民，屈大均遠來憑弔，真是無限感懷，傷慟建文境遇。或許由於建文事蹟多屬傳說，前述之清初明陵著述中均未提及建文陵墓，然《明諸陵圖說》卻以〈建文帝遜國始末〉為該書之首，全篇以「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結束。<sup>75</sup>特殊的體例，尊建文於天壽山諸陵之上的用意十分明顯。清初人士的建文情懷，也反映在《帝陵圖說》後序。梁份《帝陵圖說》第三卷雖是以金山陵墓為內容，但不以天下大師墓為建文陵，梁氏藉崇禎帝之語：「建文無陵，何處致祭？」認為：「惠宗讓皇帝亦當代之主，君天下子萬民者四年，四年太平天子，曾無杯土封樹，莫之所葬地。」<sup>76</sup>顯然梁份不以位於西山不封不樹者為建文之陵。其友許銘道也頗為感慨的說：「獨讓皇帝之或焚或亡，豈無三尺之幽宮瘞其玉質，乃至迷不可問。雖當日天下且不有，何有於身後之朽骨？然以四載繼文明之主，無一杯之土安其魄而終焉，餒如高皇之靈必有慘恫不忍者，而歷世能忍之？此亦後人所悽感不解者也。」<sup>77</sup>時人拜謁所謂的天下大師墓，正是紓解對建文的惓惓情懷。

建文之外，清初人士對明景帝陵的情懷也是深具意義。景帝於「土木之變」後即帝位，其兄英宗復辟後，以王禮葬於北京西郊之金山。其實，景帝被貶為庶人，並未以王禮安葬。「葬以庶人，掩坎金山」。成化十一年（1475）始追復帝號，修享殿三楹，神廚、神庫、省牲亭，祠祭署，、內官房，建立碑亭，大書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繚以環堵，植以松柏，守以寺人，祀以歲時」。「然未砌寶城，未建明樓，右偪側地勢，規制狹小，氣脈不佳。不但不得埽于藩，且不得下同黎庶者。」<sup>78</sup>至嘉靖十五年（1536）三月，世宗首度以天子身分，詣

<sup>75</sup> 《明諸陵圖說》，第一冊，〈建文帝遜國始末〉。

<sup>76</sup> 梁份，《帝陵圖說》，卷三，頁475，〈景皇帝陵〉。

<sup>77</sup> 梁份，《帝陵圖說》，許銘道，〈重書帝陵圖說後〉。

<sup>78</sup> 梁份，《帝陵圖說》，卷三，頁473，〈景皇帝陵〉。

金山，謁景帝陵，表達「追感之情」。<sup>79</sup> 世宗「以碑亭列門外非制，命移置門內。又命以黃瓦易綠瓦。於是乎非復帝，降而王矣。」<sup>80</sup> 其後，神宗也曾謁景帝陵。

81

由於景帝陵所在的金(西)山口，位於前往西山道旁，清初前往拜謁者頗眾。顧炎武對景帝陵有簡短的描述：「門三道，三重，殿五間，周垣。」<sup>82</sup> 梁份特闢一卷論述景帝陵為：「無寶城，無明樓，無穹碑，不封不樹。土冢隆隆起，可二三尺。周三十跬，徑十跬。方位向丙，冢而已也；而稱則陵，天下有陵焉如是者哉？冢外廣輪甚狹，周回皆墻，是為內墻，與殿墻離而為二。內墻較小，為初制非初皆無可攷也。東西橫互七十跬。北倚山，南面空虛，中通無門，墻如直弦，東西墻三面通長一百九十跬，其圓如弧，不能深廣，因山勢也。」<sup>83</sup> 梁氏為明清有關景帝陵的描述最詳細者，其重景帝陵應與景帝能土木之變後之為局有關。梁氏評論景帝說：

然土木之變，天下垂危，當日無君而有君，主神器安社稷。君臨海內，厝中國於磐石，守七年之運祚，不致拱手北送者。居守有人，保祖宗天下於弗失，非帝而誰也！<sup>84</sup>

梁份特寫景帝陵，蓋以景帝於土木之變後穩定政局，中國不至淪為「北人」統治，係基於民族大義，此正是遺民思想的表現。

梁份之友王源於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四月也有拜謁景帝陵之行，作〈景泰陵記〉，認為「英宗北狩，苟非景帝踐阼任賢能，一力戰守，其不為南宋之續者

<sup>79</sup> 《明世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民國 51 年 6 月)，185/4a，嘉靖十五年三月庚午條。

<sup>80</sup> 梁份，《帝陵圖說》，卷三，頁 471，〈景皇帝陵〉。

<sup>81</sup> 朱鴻，〈「明人出警入蹕圖」本事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 22 卷第 1 期，頁 208-210。

<sup>82</sup> 顧炎武，《昌平山水記》，卷上，頁 11a。

<sup>83</sup> 梁份，《帝陵圖說》，〈景皇帝陵〉。

<sup>84</sup> 梁份，《帝陵圖說》，〈景皇帝陵〉。

幾何。功在宗祏，胡可沒也。」對弘光上景帝廟號為代宗，也予以稱讚。<sup>85</sup>時人感於景帝之際欲與陵寢之荒蕪，不少以「廢陵」稱之。汪懋麟（康熙六年進士）作〈景帝廢陵二首〉：

山雨淋漓殿瓦荒，泉聲哀咽繞宮牆，千秋社稷悲忠肅，四尺孤墳葬景皇，  
輦道寢門俱寂莫，玉魚金盃亦淒涼，不如奴僕埋幽地，祠樹碑陰尚鬱蒼。

旁多諸  
闕墓道

懊惱南城樹已荒，何人封事築回牆，當年若冑稱監國，沒世應須謚讓皇。  
一穴龍髯終斷絕，兩株荆樹起悲涼，我思季扎真千古，惆悵園陵曉色蒼。

86

李良年（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明景泰帝廢陵二十韻〉，自謂「野老拜衣冠」，敘景帝之功業與行事之得失，以「豐碑還在目，拂拭感無端」結束全詩，感傷不已。<sup>87</sup>王頊齡（康熙十五年進士）亦作〈故明景帝廢陵〉，全詩以議論敘事，贊景帝之功，斥奪門之非，悲陵寢之頹敗，表露沈鬱頓挫之情，時人譽為不朽之絕作。<sup>88</sup>諸人皆非遺民，過景帝陵之所以賦詩，乃因傷懷之故，為景帝抱不平。汪懋麟、李良年、王頊齡皆非遺民，且只留下拜謁景帝陵詩句，而無謁十三陵者，更凸顯了清初人士對景帝陵特有的情懷，諸人既以景帝陵為廢陵，卻情有獨鍾，豈無深意在焉？吾人以為諸人謁陵應是對抗禦外族的景帝致崇敬之意，客觀環境難以作遺民，透過謁景帝陵宣洩藏於內心最深處的種族意識，紓解易代之際士大夫無奈的心境。

<sup>85</sup> 王源，《居業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 1418，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讀雪山房刻本），19/6b-7b，〈景帝陵記〉。

<sup>86</sup> 汪懋麟，《百尺梧桐閣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41，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10/6b，〈景帝廢陵二首〉。

<sup>87</sup> 李良年，《秋錦山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51，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乾隆續刻李氏家集四種本），3/22b~23a，〈明景泰帝廢陵二十韻〉。

<sup>88</sup> 王頊齡，《世恩堂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五冊，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6/13b-14a，〈故明景帝廢陵〉。

## 六、結論

清朝君臣士子拜謁明代陵寢，留下大量的詩文，的確是國史僅見的現象。其中所蘊含的明陵情懷，因身分與所處時代的不同，呈現了多樣的風貌。毫無疑問，清人濃烈的明陵情懷，與清室以異族入主中國，出於懷柔漢人的考量，入關伊始就確立了尊禮勝朝的政策有關。清廷崇禮前明，陵寢是非常重要的環節，由於明朝末代皇帝崇禎以身殉國，清廷以禮葬崇禎為崇禮勝朝陵寢的第一步。全面保護及祭祀明北京天壽山陵寢，惟對於萬曆時期雙方的宿仇，及明毀金陵的做法，仍無法釋懷，故而對神宗陵寢一定陵，春秋不予致祭。順治、康熙時期，對天壽山陵寢著重於保護政策，而非帝王的親自拜謁。乾隆晚年，清帝對明十三陵的崇禮作法有了重大的轉變。乾隆躬謁明長陵，修繕天壽山勝朝陵寢，經金山望景帝陵。乾隆的陵寢詩文，更有歷史味，是藉謁陵自我吹噓，扮演歷史判官。就其行事，有隆禮勝朝之表象，然其論前朝事語多訛譏，偏離公道。惟百餘年來清帝尊禮勝朝陵寢的做法，成為了祖宗家法制度，進入中葉季世，國力雖衰，仍以勝朝陵寢為念。

清初對明陵的尊禮保護政策，使士人也能前往故國陵寢致意。其中以遺民表現最強烈，他們將國難之後的故國之思毫不保留的寄託於陵寢，最具代表的人物為顧炎武及梁份。兩人都有對明陵的一手書寫，有志一同的以春秋之義稱崇禎陵為攢宮，對清順治、康熙尊禮明陵的做法絲毫不領情。兩人的著作對天壽山及西山陵寢形勝與規制的記述，為研究明陵的重要史料。時人有雖入仕清廷，然於故國不能無思，如譚吉璉者，也有書寫陵寢之作。與遺民有異，譚氏盛讚順治對崇禎帝、王承恩陵墓的崇禮，以及維護明陵的政策。惟其著書保留一代陵寢規置，絕不多讓顧、梁兩位遺民。由梁氏與譚氏著作手抄本的傳世，當知清廷雖在政策對勝朝陵寢加以保護並禮敬之，然在官員士子間有關明陵書籍的刊行應是有忌諱的。懷故國之思的人，前往北京天壽山西山拜謁明陵，留下詩文，收錄於文集中。

值得注意者，清初人士對明景帝陵似情有獨鍾，應是肯定景帝抗禦外族偉業，將對易代外族統治的無奈，寄情於景帝陵。

清代君臣子民的謁陵詩文，不乏是論史之作，而非單純的睹景傷情，清人的明陵情懷可說是歷史書寫的一種表達。清朝的皇帝，特別是乾隆的謁陵之作，是對明朝每個皇帝進行評價論斷，表現的是乾隆「春秋，天子之事也」的以史御漢的一貫策略。<sup>89</sup>當皇帝藉謁前朝陵寢進行歷史的評斷，官員士子的書寫空間自然會受到相當的壓縮。康熙之後，不再有論述明代陵寢的專著，謁陵詩文的數量也銳減，當由此理解。詩文亡而後圖繪作，乾隆之後圖繪明十三陵，是清代明陵書寫的另外一種方式，圖繪雖可寄情，然不若詩文易於傳播，作用遠不如詩文大。對清人而言，明陵成爲清廷表示對勝朝崇禮的象徵，終清之世都加以保護，並行春秋之祀，具有高度的政治作用。

---

<sup>89</sup>葉高樹，〈乾隆時代官修史書的教化功能—兼論乾隆皇帝統御漢人的策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2 期，1994.6，頁 171-199